

自由主義思想家傅斯年傳略—— 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傅斯年先生（1896-1950），係我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也是學界公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焦潤明，2002）。先生生於苦難的中國，以讀書報國、教育救國為職志。個性清廉耿介，一生敢作敢言，對於政治與教育時弊，勇於直諫，同時對於史學研究以及高等教育更有大作為，特別是在其晚年主政的臺灣大學，為捍衛自由的學風，所作的努力，夙為國人所欽重。其言行思想，有諸多值得教育界所學習與效法之處。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略，再說明其教育思想，最後再闡述其生平事蹟與學說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二、生平簡述

依據傅樂成（1979）、李緒武（1998）、焦潤明（2002）、歐素瑛（2006）以及維基百科（2020）的論述，傅斯年先生的生平可以簡述如下：

（一）出生書香門第，刻苦求學的生涯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省聊城縣人，生於清光緒 22 年（1896），正值滿清腐敗，列強割據中國之際，先生和同時代的諸多有識之士一樣，早歲便心存以讀書報國、以教育救國之大志。

傅斯年出生於沒落的士族家庭，祖父傅淦，為前清貢生，博通經史，且精通醫理。父親傅旭安為前清舉人，致力教育工作，曾任山東省東平縣龍山書院山長。然傅旭安於 39 歲時便英年早逝，以致傅家家道清貧，生活極為艱難。然正由於清貧的家庭環境，使得傅斯年養成艱苦卓絕、努力奮鬥的人生觀。

1905 年傅斯年入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並由祖父親授課業，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祖父不僅以居家課孫為樂，還親自傳授傅斯年經史文學，另由於個性與行為上的潛移默化，對於傅斯年一生痛恨政治，不願入仕，疾惡如仇的正義感有頗為深遠的影響。

除祖父之外，對傅斯年影響最大的是侯延瑛，侯延瑛係傅旭安的學生，少時孤貧，受傅旭安的知遇之恩，得以入龍山書院就學，後考取進士，返回故鄉時，

恩師已過世，乃自誓要撫養傅斯年兄弟長大成人。侯延瑛雖是前清進士，但思想並不保守，能與時俱進，積極參加辛亥革命，對於傅斯年關心國事、關心政治的態度也有深遠影響。

1908 年，傅斯年隨侯延瑛至天津，1909 年考取天津府立中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從而為他考入北京大學以及其后的留學生涯奠定基礎。由於恩人侯延瑛的幫助，傅斯年的人生不但發生重大的轉折，也影響了傅斯年知恩報恩的人格特質以及其後辦學時對於清寒的學生特別重視與照顧的教育理念。

1913 年中學畢業後，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乙部，攻讀文史。傅斯年不但成績優異，在課外活動中亦嶄露頭角，曾與沈沅等人發起「文學會」，以修繕辭令、發展思想為宗旨。三年後，1916 年傅斯年升入本科國文學門，深得國學大師劉師培及黃侃的器重。1917 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任教北京大學哲學系，傅斯年成為胡適的授業弟子。胡適驚異於傅斯年的國學素養，傅斯年則對胡適科學思維與新見解，頗為心儀。

（二）參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傅斯年就學北京大學時，躬逢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所發生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反帝國愛國運動，也是一場思想啟蒙和新文化運動。胡適、陳獨秀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以及白話文文學，獲得廣大青年們所支持和體現。

1918 年，傅斯年邀集羅家倫、毛子水、顧頡剛等人，創立「新潮社」。翌年 1 月 1 日，新潮社出版一份代表學生的新刊物《新潮》月刊。第一期主編是傅斯年和羅家倫，傅斯年撰寫〈發刊旨趣書〉，羅家倫發表署名社論加以補充。在政治態度上，《新潮》強調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學術上，《新潮》主張，知識份子有責任發現當代中國社會的需要，加以推動，並要了解歷史的潮流，透過國學研究，以探求現代中國及現代思潮應取的方向。《新潮》月刊影響頗廣，傅斯年也因此成為著名的學生領袖。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傅斯年被推為北京大學 20 位學生代表之一，對現實問題及政治活動表現出高度的熱情。5 月 4 日當天，北京大學等十三所校院三千餘名學生匯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傅斯年擔任總指揮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堪稱五四運動的健將。

(三) 留學歐洲，普被西方學術

北大畢業後，傅斯年旋回山東參加官費留學考試，成績優異。惟因少數考試官以傅斯年為五四運動領袖而不擬錄取，經山東省教育廳陳豫科長力爭，堅持以考試成績為錄取標準，先生得以榜上有名。

1920 年夏，傅斯年赴歐洲留學，先在倫敦大學大學院研習三年半後，轉赴柏林大學。在遊學六年半時間中，大部份時間都在研讀實驗生理、心理、物理學、數學在內的自然科學，在柏林大學哲學院後期才開始攻讀歷史語言學、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留學期間，傅斯年廣泛接觸各種新學，對其後的思想及事業發展產生鉅大的影響。

(四) 學成回國，擘劃歷史語言研究所

1926 年 10 月，傅斯年因得知北伐成功而回國，在朱家驊校長邀請之下接受中山大學之聘用。1927 年任該校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並創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為首任院長，在蔡元培支持下，傅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等人，積極籌劃並負責創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從 1928 年 9 月至 1950 年 12 月，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長達 22 年，是其任期最長，對學術界最有貢獻的職務。他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成與生物學、地質學同等樣的科學。他以科學的方法治歷史語言之學，並且倡導集體研究的方式，集眾人的智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學、語言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大陸時期，多年來集體的努力，卓然有成。首先在 1928 年策劃並開始河南安陽殷墟之發掘，直到 1937 年，十年間凡發掘 15 次，先後由董作賓、李濟主其事，發現大量殷代銅器及甲骨文，經董作賓、李濟及其他學者的共同努力，遂使商代史事，由隱晦而日趨明顯，中國之信史因此向前推進了數百年之久。此外，在民族學方面，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田野調查研究也很有成就，在歷時 20 餘年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考察中，總計蒐集到 1,100 餘件之民族文物、民族文書 800 餘種、田野照片約 8,000 張，以及無數的語言、民俗、體質測量資料等，成果十分豐碩。

(五) 書生報國，拳拳赤子之心

基於愛國、愛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傅斯年在治學之餘，也是十分關心國事。1932 年，日本為合理化占領中國東北三省而極力宣傳「滿蒙在歷史上非屬中國

論」，先生乃憤而疾書《東北史綱》第一卷，以民族學、語言學、史學與地理學資料，證明東北本為中國郡縣，與中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嚴正駁斥日人的謬論。

傅斯年對貪污腐敗疾惡如仇，1944年，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院長貪污舞弊，罵他是皇親國戚。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發國難財，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從這兩件事，可見傅斯年敢言人之所不敢言，頗有古代御史之風。

(六) 代理北京大學校長，致力於接收復員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傅斯年欣喜若狂。抗戰勝利後，政府擬任命傅斯年為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堅辭，並極力推薦其師胡適。在胡適未返國到任期間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致力於克服二大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復員問題，要從大後方昆明遷回數千員生和龐大校產，其困難可想而知。第二個困難是偽北大教職員問題。這批為數眾多的偽北大教職員，組成團體，到處請願，要求北大復員後繼續留用，先生基於民族氣節，絲毫不為所動，聲明絕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在傅斯年的努力下，北京大學得於在北平順利復課，先生居功厥偉。

(七) 擔任臺灣大學校長，捍衛自由學風

1948年12月，傅斯年受命接掌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任期雖不滿二年，卻做了幾件大事，為臺大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使臺大成為一流之大學：第一是在臺灣光復後國家財力極為艱難下，力爭經費，興建校舍與學生宿舍，擴充圖書儀器設備。第二是成立教員聘任資格委員審查委員會，先後聘請多位國際知名教授到校任教，如李濟、董作賓、毛子水、英千里、錢思亮、蔣碩傑等，一時臺大大師雲集。第三是重視學生生活與學業，並建立嚴謹的考試制度，招收一流學生到臺大就學。第四是極力整頓校務，尤以醫學院著力最多，他所奠下的改革基礎，使得臺大醫學院成為如今蜚聲國際的一流醫學院。

傅斯年最令人稱道的是捍衛校園自治、學術自由的學風，極力阻擋政黨政治介入校園。1949年7月11日，筆名葉青的反共專家在臺北《民族報》發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反共教育與自由主義〉，文中指控傅校長繼承北京大學自由講學、自由研究的傳統風氣。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後，亦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臺灣來，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黨分子和親共分子，以致校園成為共產黨的溫床。面對各種不實的指控，傅斯年一一加以駁斥，並聲明其堅持學術獨立、拒絕政治力干涉學術的立場。

1949年4月6日，臺灣大學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臺師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學潮，傅斯年雖然贊成執政當局要快而澈底地肅清匪碟，但要求不能流血。也就是秉持此一原則與態度，傅斯年於四六事件當下，曾向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晚年傅斯年健康狀況不佳，患有高血壓。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列席臺灣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答覆參議員郭國基對臺灣大學招生宜放寬尺度等問題時強調：「我對有才能、有智力的窮學生，絕對要扶植他們！」由於過度激動，突發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僅55歲，令人不勝唏噓。傅斯年逝世後，葬於臺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

三、教育學說

李緒武（1998）指出，基於愛國、愛教育的讀書人情懷，傅斯年對於當時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措施，極表不滿，力主改革。他批評當時的學校教育是層層過渡的教育、是游民教育，是資格教育，是階級教育。

因為是層層過渡的教育，所以每階段的教育都沒有既定的目的，學生入學都是以升學為目的，不是以求學為目的。改革之道在不要沿用「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等具有階級式的名稱，例如小學宜改稱國民學校，並且每一階段的教育皆有其自身的目的，學生畢業後就業而不升學者應佔多數，才算成功。

所謂資格教育，是說學生入學的目的，在混個資格，取得畢業文憑，以做升學之準備。這種學校教育愈發達，造成升學既無能力、就業又無一技之長的游民也愈多。改革之道，要重視學生能力的訓練，也就是生產的訓練。

傅斯年亦批評學校教育淪為階級的教育，也就是說上層階級所受到的教育機會遠高於下層階級者。改革之道，係教育機會均等，使得教育不要因為貧富不均，影響窮學生的教育機會受到不公平的影響。除了要採用嚴格的考試制度來招生之外，民間和政府要大力設置清寒獎學金。他在臺大校長任內，除為大陸來臺無依無靠的好學生爭取救濟金之外，一方面擲節學校經費，為臺籍貧寒學生設置獎學金，便是此一理念的實踐。

焦潤明（2002）指出除了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之外，傅斯年亦有下列四個教

育理想。其一是，品性教育與做人教育，亦即教育的一個重要功能係在陶冶學生的品性，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學生具國民意識和立誠的品質。其二是，培養國民綜合素養和能力的教育。其三是，實現學校的多樣化和個性化，亦即學校辦學可以各有特色以及因材施教以發展學生的個性。其四是，平淡無奇的教育，亦即為學生創造出優雅的環境、濃厚的學術氛圍即可，讓學生「有房子住，有書唸，有好玩的東西玩」，便是好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上，傅斯年主張大學是學術教育，應以學術為本位。對學生應著重培養問題探究的興趣與研究能力。在課程設置上，應廣泛推行講座制。普通課程應由最有學問與經驗的教授擔任，以便引導學生走向正確的探究學問之道。更重要的是，為實現學術教育的目的，大學應保持獨立性以及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風氣，不受各派政黨、各派宗教的影響（焦潤明，2002）。這些見解均體現了傅斯年的自由主義教育思想。

四、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綜觀傅斯年先生的事蹟與思想，有許多值得臺灣教育界學習的地方。首先，在教育行政機關上，應致力於教育制度與措施的改革。就筆者所關心的師資培育方面，我國師資職前培育已立法並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初任教師導入輔導以及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我國的制度仍未法制化，以致於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未能普及化，資深教師的專業發展缺乏系統化、計畫性的推動，以及教師評鑑、教師換證、教師生涯進階等制度迄今仍未建立，遠遠落後先進國家數十載，是令人相當心急與擔憂的事。

教育行政機關亦應重視教育機會均等理想的實現，對於偏鄉地區的學校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補助；對於處於性別、社會階級、族群等結構上弱勢的群體，應採用「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之方式，針對既有社會結構不平等現象做彌補，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資源，以保障其發展的機會。

其次，對於學校教育而言，中小學不應過度重視知識教育，以及過於強調學生的升學，成為「層層過渡的教育」、「資格教育」，也就是升學主義的幫手。反之，應重視學生五育的均衡發展，特別是學生在誠實等品性的培養，使學生成為有仁愛、能致誠的好國民。另外，學校也要發展特色，以特色、多樣化的教育活動來吸引學生，來發展學生音樂、美術、體育、科學探究等多元的智慧。

對於大學而言，應重視學術的追求，除堅持大學獨立自主，摒除政治與宗教的不當介入之外，更應強調「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除重視學生的生活環境外，更應重視與要求學生在學術上的探究與學習，培養「懷疑、求真」之科學態度。

對於現代教師而言，傅斯年的思想與事蹟更有許多的啟示。第一，教師應體認家庭教育的重要，而加強與家長的親師溝通，就像傅斯年的學習與人格發展受到其祖父與父母的影響，家長對其子女的影響甚為巨大，是故如何借助家長的力量，來配合學校教育，達成教育的目標，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教師應體認其本身就是學生的最大貴人。透過貴人啟導，孩子的潛能得以無限地發揮。就像傅斯年受到侯延瑛、蔡元培、胡適等貴人協助一樣，教師對於學生的鼓勵、協助與教導，將影響學生人生的改變與發展，是故教師要盡心盡力地栽培學生，並以學生的成就為榮。

第三，教師要有強烈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與實踐。對於社經文化背景弱勢的學生要特別關注與照顧。讓這些孩子有更多的鼓勵，有更多的獎助，有更多表現與發展的機會，才是真正公平的教育。而這種教育方式，才是最能提升學生附加價值的教育。

第四，教師要把每個學生都帶上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固是人生之一樂也；對於學習程度中等的，能夠提升其學習成就，是值得嘉許的；對於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提升其學習潛能，才是最令人敬佩的，這樣才能落實傅斯年「個性化」教學、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第五，對於學生的學習發展，不宜過度強調學科知識的訓練，甚至流於升學主義的共犯結構之一，而是要加強學生能力與綜合素養的發展，而「學習能力指標」以及學生的「核心素養」便分別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及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所要達成的教育目的。

第六，教師應有終身學習、終身反思的理念與實踐。須知知識進步，一日千里，教師若持保守封閉的文化，安於現狀，而不能與時俱進，勢將為時代所淘汰，反之，若能形塑進步開放的文化，本身不斷的成長與蛻變，才能帶給學生新知識、新技能、新生活適應的能力。

第七，教師的專業發展可以是個別的，更可以是群體的。就像傅斯年以科學的方法治學，並且倡導集體研究的方式，才能做出更好、更豐碩的研究成結果一樣，教師的專業發展亦可以採取「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這樣不但教師的學習可以更豐富化，而能更能形塑合作分享的教師文化。

五、結語

傅斯年先生誠為我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大師級人物。他在新文化運動、建構歷史語言學、代理北京大學校長、擔任臺大校長皆有開創性的貢獻。他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更是令人景仰。謹對先生的事蹟與思想，表達崇高的敬意。

參考文獻

- 李緒武（1998）。傅斯年。載於劉真（主編），**師道**（頁408-418）。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 維基百科（主編）（2020年12月16日）。**傅斯年**。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85%E6%96%AF%E5%B9%B4>
- 焦潤明（2002）。**傅斯年傳**。北京市：人民出版社。
- 傅樂成（1979）。**傅孟真先生年譜**。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
- 歐素瑛（2006）。臺灣大學自由學風的捍衛者—傅斯年。載於國立教育資料館（主編），**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頁49-60）。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